

## 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

陳光興 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 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

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從當下的歷史時刻來看，這或許不只是簡單地對過去實踐回顧的問題。能夠回顧的條件是什麼？基礎何在？回顧是對過去的揚棄或是傳承？是在逃離還是深化問題？文化研究這樣的會議現在由國科會主動在這個時候召開(1999年9月)，它很顯然是文化研究正式組織化與體制化的展現，但是這又意味著什麼？<sup>1</sup>這些可以不斷演繹的問題畢竟牽扯到理論性的思索，甚至於倫理學的關懷，以及無法閃躲的立場問題。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以這樣的發問來思考文化研究在台灣的定位與實踐，雖然不可能成為具有普遍性的共識，但是至少它是一個開放的、可以不斷被重新思索的問題。或許，只有不斷的提出這樣的問題才能讓文化研究保持它該有的批判性活力以及敏銳地面對新的情勢。

文化研究學會於去年(1998)尾正式成立。1999年初，當時還負責國科會人文處的黃榮村教授為了能夠正視及承認文化研究存在的正當性<sup>2</sup>，交代我們以過去「學門現況會議」的模式來籌辦今天的會議。在99年1月的理監事會議中，我們認識到這是文化研究第一次

舉辦所謂的「學門現況會議」，但是相較其他學門而言，我們沒有任何既有的資料可以繼續深化比較，也沒有任何的行政機構<sup>3</sup>可以依靠來收集既有相關人力資源、研究狀況的資料，所以一切必須靠我們自己無中生有、發明創造。更重要的是我們其實不是很清楚的能掌握文化研究在台灣過去到底在學術研究及論述上是否有累積？累積了什麼？它能逐漸形成的歷史條件是什麼？它與台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是什麼？期間轉化的動力又是什麼？在什麼意義下，文化研究在台灣足以構成是一個學門，或是更準確的說，在夾縫中的次學門？這些可以繼續列出一長串基本的問題，如果沒有初步的回答，光處理學術行政問題，相當可能會全然喪失根本知識上的動力。因此在一開始九月的這個會議的定位就不完全是「學門現況會議」，也才有了「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的會議定位，企圖透過這個會議開始來描繪文化研究在台灣的歷史形構。

經過長達半年的構思與組織，最後這個會議呈現出來的領域涵蓋了：空間、理論、翻譯、女性、身體、同志、後殖民、電影、媒體、大眾文化。這些基本上是學會主動邀請的論文<sup>4</sup>，不是按照傳統學院科系分類方式(在分類創新上台灣的學術行政是相當保守的)，而是按照我們觀察到文化研究在台灣所呈現的主題／主體似乎已經累積到有相當的能見度而且需要被回顧、檢討與反省。這樣的呈現在一定的層次上(雖然不完整)反映了文化研究在台灣所浮現的狀況。

除了論文外，我們規劃了三場圓桌論壇。文化研究與教學——分享與展望部份，以對具體問題的反思來討論。在跨學門對話的部份，我們請來分屬傳播、中文、社會、歷史、人類、心理、教育各學門中<sup>5</sup>，參與文化研究的學者，從他們自身的理論關切及經驗層次上提出他們的

觀點。文化研究的出現在不同的社會科學領域中造成不同的困擾，有些是在認識論層次的，有些是在學術分工層次的，造成一些領域最起碼是表面上的不知所措。這個論壇雖然沒有碰撞出激辯的火花，然而展現的確實是文化研究的跨領域性，凸顯出文化研究在各個領域中衝闖出來不同的有趣效應。

在會議架構構思的過程中，我們認為新興的網際網路文化已經在台灣逐漸展開，而且是一股不能被忽視的力量；任何的組織、團體、刊物都有點被迫要與網站發生關係。本來我們應該有論文像其他領域一樣專門來回顧網路文化的研究，或許由於它的存在還太新，所以在文化研究的領域中並沒有累積到一定的研究質與量；但是基於這個新興領域的重要性，我們於是有了網際網路文化批評圓桌論壇的構想，最後請來了較為年輕一代的幾位朋友，她／他們在台灣的網路世界中已經有相當的實戰經驗及累積，同時也對現況有反思、批評與不滿。結果這一個場次確實展現了更多的衝擊與活力，衝突矛盾最多的就是在這場論壇中出現。

### 被忽略的場域及研究方法及議題的開展

在籌辦過程中，感受特別深刻的是在目前文化研究領域中在台灣幾個重要但是被忽視，或著是被漏掉的場域，以及研究的方向。原住民的文化研究是文化人類學的重點研究焦點，而號稱從事文化研究的人卻很少敢碰原住民研究，縱使有，也是相當的片段、零星，沒有可觀的累積，這當然與語言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不必然，都市早已成為原住民的棲居地，許多原住民也用漢字／華文書寫。是因為文化人類

學的龐大傳統使人怯步？相對而言，文化人類學又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風潮？文化研究到底與文化人類學有什麼樣連結的可能性？回過頭來看，從《獵人文化》所開啟的論述傳統，一直到《山海文化》，文化研究到底要如何與原住民文化研究產生有機的接合關係是相當關鍵的問題，難道文化研究在臺灣只是意味著漢人文化研究？

相當類似而又在不同層次、很明顯的空白是工人階級的文化研究。大家所熟悉文化研究在英國的實踐是與階級問題無法分離的，從早期的 E.P. Thompson, Raymond Williams，到後來的 Paul Willis，Dick Hebdige 與 Angela McRobbie，都是以勞工階級為研究的主體，更遑論國際上文化研究個個場域中所充斥的階級分析。相對於其他的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女性與同志研究無可否認的成為台灣文化研究的主力，那麼，這樣的留白在臺灣要如何解釋？是階級問題尚未成為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所展現力量的薄弱(而無法像女性議題一樣提出入憲四分之一保障名額)？還是研究者自身的階級位置與認同？或是台灣社會共同的階級恐懼症或是恐左病，一談階級問題就馬上與對岸的老共劃上等號？我個人沒有答案，或許只能期待未來台灣的文化研究能夠不讓這塊重要的領域開天窗。

同樣的，青少年文化研究一直是國際性文化研究的重點，特別是在東亞的漢城及東京，青少年也明顯的成為研究的主體。我個人參與導航基金會的董事會，很清楚的看到台灣社會的主導性論述還停留在把青少年群體當成是問題來處理，研究也大都是輔導取向。但是只要有點社會敏感度的人都知道青少年主體已經在快速的浮現，這些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主體群無法用既有的思考方式來理解；當近來的政治選舉訴求中，他／她們已經成為各個候選人的新寵兒時，台灣的文化研

究在這個青少年場域中還沒有出現細緻的研究與論述，再一次看到我們落後於新情勢。我們同樣期待這個主體領域能夠在未來成為研究重點。

除了上述的幾個領域外，新興宗教、社區營造、老人文化、乃至於各種類型的文化政策研究都很可能逐漸受到關切。特別要指出的是媒體新科技，網際網路、衛星電視已經是全球化結構中不能再被忽視的場域，台灣近年在社會學及傳播學界已經開始有些研究出現。文化研究聲稱走在時代的前端，但是對尖端結構性現象卻沒有研究是很難自圓其說的。

一般而言，文化研究最為人詬病的就是歷史深度的淺薄，沒有歷史性的解釋，一切訴諸抽象的理論概念，最後是站不住腳的；後殖民研究如果在文化研究造成關鍵性的影響力，甚至於是典範性的移轉，很可能就是在根本質疑理論概念的殖民性，以及解釋力的不足。歷史研究的取向似乎已經逐漸在國際文化研究形成未來研究方向的共識，我們期待台灣的文化研究與歷史學的領域有更為深刻的互動。

在台灣還常聽到或是感覺到文化研究往往被當成是一種外來的東西，所以沒有存在的正當性；奇怪的是，如果同樣是所謂的舶來品，似乎很少人挑戰人類學、社會學、乃至於傳播學的正當性，更別說挑戰台灣既有人文社會學科的存在及其分類的殖民性複製。但是文化研究真的可以因為外文系參與的人較多，而被簡單的定位成外來的領域？這樣的講法實在太化約了。我個人以為在中文的系統中早就有文化評論及批判的傳統，縱使它跟現在所想像的文化研究不全然一致。如果不是在我們既有的環境中已經有它存在的因子，我們很難解釋文化評論何以能夠在八〇年代末快速的崛起？文化研究這個領域又何以

能快速的在亞洲各地形成，特別是它的長相在到處都不一樣？

## 文化研究在台灣形成的初步歷史性解釋

我在一開始就提出了我的發問：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在一個層次上，這樣的問題不可能抽象地來回答，而必須歷史地來面對。前面已經點到，要解釋文化研究今天能夠在學院中出現，如果放在台灣社會的歷史脈絡來看，必須要釐清至少三條線索。

(1)最為主要的是，我們自身思想文化中早已存在的文化論述傳統，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出接合到國際上文化研究興起的風潮<sup>6</sup>，至於接合點何在還有待更為細緻的分析，在更為具體的場域中來探究才能解釋其間的連結點。

(2)第二條線索是跨學科「理論」論述的流行風潮，在思考及方法的層次上突破既有學門的切割，提供了後來跨領域研究的空間。從早期的存在主義、到後來的詮釋學、結構主義、符號學、精神分析、新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同志論述、後殖民研究<sup>7</sup>，乃至於近期有關全球話的討論這些理論論述都不屬於特定的學門，身處不同科系的研究者都投入到這些風潮當中，在效果上對於主流的學術分類方式造成鬆動。這個部份所形成的論述結構其實相當複雜，在特定場域造成不同的影響。例如比較文學領域的興起曾經至少在外文學界成為理論研究的棲身之地，而社會理論似乎也在這個潮流中逐漸轉型，脫離社會學及哲學的範疇、滲透到其他的空間。這些穿透各個既有學門的理論論述多多少少反映出學門分類的僵硬性已經沒有辦法面對當代知識生產的複雜性，容許多元異質的新空間必須

被開放出來面對新的情勢，而文化研究正是承續了這種新的可能性。文化研究學會會員所屬學科／所系的混雜性可能是台灣其它學會所沒有的<sup>8</sup>；更可貴的是學會有相當一部份的會員不是學院中人<sup>9</sup>。

(3)第三條線索則必須要聯繫到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社會的巨變，特別是政治及社會運動的衝闖，這種變動的產生使得多元縫隙能夠出現，其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當時風起雲湧的文化批判／評論，它直接關連到今天的文化研究，或是說當時的文化研究是以直接介入社會的文化批判的形式來出現的。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比我更早的前輩們會有更具歷史性的看法／觀察)，在八〇年代末創新、混亂、開放的社會情況中，《自立早報》副刊在劉克襄、特別是顧秀賢高度自我意識的主導下，帶動了其他報紙副刊的時代性轉變<sup>10</sup>。除了《自早》激進的以整版外包製作給予年輕一代評論人開放的空間外，大量的團塊狀專欄也在各報湧現。文化批評不只在報紙副刊置換了文學創作及批評，同時在總體的文化空間中創造出一種新的文類，不同的文化商品，不同的書寫方法，與其他既存的論述形式產生交鋒；例如，當時許多最為尖銳、有趣的政治評論是在副刊中出現<sup>11</sup>；在《自早》的帶動下形了解嚴後新文化商品的競爭，其他副刊快速跟進，於是各報副刊專欄林立，在高峰期還出現了所謂的〈文化觀察版〉。這種論述形式不只以報紙副刊為基地，它也開始大量浮現在雜誌形刊物(如《中國論壇》、《人間雜誌》、《新文化》、《當代》、《電影欣賞》《聯合文學》，以及運動組織的機關刊物像《婦女新知》、《台灣工運》、《獵人文化》與晚近的《騷動》)，甚至是滲透到新聞性雜誌形刊物，以及學術刊物(如《中外文學》、《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等)，乃至於以書籍形式出現(如唐山書店的「戰爭機器叢刊」)。其中最為

明顯的集結點大概就是已經成為某種 legacy 的《島嶼邊緣》(1991-5)。到今天還延續、保有這個批判空間的可能只有《立報》與《破週報》／《Pots》，以及極少數還容許非常零星文字出現的副刊了<sup>12</sup>。

隨著市場的緊縮、政治權力的改組完成、反對性社會運動能量的體制化，原來相對存在的激進縫隙逐漸消失，媒體呈現相對保守化的現象——或許有人會認為之前副刊的功能被民意論壇所取代，但是真實的狀況其實是：不但具有批判性的文化副刊倒退成不痛不癢的文藝副刊，而且由於民意論壇的特殊時事現實性質與「新聞性」性格，使得之前文化副刊那種帶有烏托邦色彩、超現實但又貼近現實的性格、不受限於現實邏輯、主流思惟邏輯、或純粹邊緣、有攻擊性的文章都不可能刊登，所以事實上媒體民意論壇板雖然有某種自由化的公共論壇的性質，也確實是之前報紙媒體所沒有的，但是它畢竟排除了某些文類，這也是台灣公共論壇的危機——只有符合一定書寫形式、立場的文字才能進入所謂公共論壇<sup>13</sup>。學院在這些轉變下，才慢慢成為這股力量的集散地，以文化研究的形式來出現。當初參與在這個過程中的寫手，學院中人其實只是一部份(以《島嶼邊緣》為例，它的組成份子相當多元混雜的<sup>14</sup>)，而且也相當不認同我們自己所處的學院菁英位置，例如在書寫上不斷用不同的筆名來置換跟自己的謀生職業黏在一起的名字，一直到今天轉變成必須強迫自己接受，當初之所以有發言位置的文化資本，不僅僅來自於我們的快筆及市面上沒有的怪想法，而確實與我們盤據了學院位置的客觀事實有關<sup>15</sup>。

無論如何，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大量出現具有相當原創力的文化評論相關文字(甚至是影像)散落在個個報紙副刊、邊緣刊物、另類媒體，需要被重新分析整理，才能畫出這些變化的轉折，成為我們共同



的文化資源。或許由於材料過多，短時間無法整理，所以沒有人願意批判的來回顧這一段所謂文化批評的年代<sup>16</sup>。在未來，這段文化批評風潮的必須被有系統的回顧，重新整理這個必須被面對的過去。從這樣的角度來思考，逐漸在學院中開始成長的其他領域像電影、電視、小劇場、攝影、網路等等，都可能可以重新連結它們與影評、電視評論、劇評等的歷史關係。事實上，根據我個人的理解，這個文化批判起落的現象並不是台灣所特有，南韓的批判圈在幾乎同一時期也發生相當類似的「運動」。

### 建制化的危機

坦白說，從上面歷史敘述可能很容易理解，負責籌劃這個會議對我個人來說是相當衝突矛盾的，原因在於，對於我們一些人來說，很難否認的是文化研究在學院的開始扎根，其實意味著從社會中撤退出來，不太可能談的上是轉進：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正在於介入社會的論辯，而非倒退到象牙塔中。當初我們有些驚訝之餘、也支持國科會人文處主動將文化研究列入中文、外文、社會學的次學門是有特定的原因(最近似乎又從中文學門中刪除)。過去這幾年有一定數量與文化研究相關的朋友——今天都是學會的成員(有此一說，文化研究的成員是一群有自尊的人渣、或是個個既有學門中的邊緣份子)——在各類申請案中相繼在各個學門被封殺<sup>17</sup>，因此我們認為次學門的出現至少有些正面的保護作用，讓不同於以往的跨領域研究能夠有一定的生存空間；也因此，我們從來沒有野心想把文化研究變成與其他既成領域平行的獨立學門，只是希望有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空間。簡單的

說，文化研究學會的成立，基本上是防衛性的(defensive)。但是，在理念上，我個人認為文化研究應該只是一個開放多元交錯的場域與符號，才能保持它的持續性活力；對於它是該成為是一個次學門，特別是它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其實有相當大的保留。

其實在國際上，文化研究要如何定位，是一連串爭論不休的問題。在外部，它的敵人認為它最大的問題就是出在逐步的建制化，因為它開始分割別人的地盤；而真正的批判性思考來自於文化研究的內部，許多人都擔憂一旦建制化，它會因為馴化開始服膺學院既有的遊戲規則，而喪失它的動力，開始逐漸與社會的互動減弱。當然這些顧慮不能放諸四海而皆準，不能本質主義的來思考，建制化的意義及效應在各地因為社會性質的不同而有差異。最糟糕的是美國的實踐在台灣往往被當成是準則及拷貝的對象，但是仔細分析會發現它是最不好的特例：在世界各地，只有美國的文化研究起自學院，也關在學院的圍牆內，這多少是因為美國有世界超大型的學術市場，使得學院可以自成體系<sup>18</sup>；但是市場大也不必然如此，日本也有相當大的學術市場，但是跟東亞各國一樣，沒有一個地方有清楚的學院與社會的分界，也才會造成日本一份學術人文刊物會常有上萬份的發行量，這在美國是無法想像的<sup>19</sup>。從歐洲、拉丁美洲、非洲，到亞洲乃至於台灣，文化研究都與社會空間、不同的社會運動密不可分，絕對不是孤立在學院內的。如果留美派(包括我自己在內)看到美國的模式，就認為文化研究的學院化是理所當然的，那是全然的誤導，美國其實是特例，有它特定的條件，不是其他地方可以或是應該仿效的，台灣的學術市場太小，文化研究在台灣不但沒有條件也沒有必要被關入象牙塔中。

## 文化研究作為一種國際性浪潮與運動的辯證

無可否認的，文化研究在全球很多的地區成為一股無法抵擋地風潮、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運動。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在英、美、澳洲等地，文化研究學院建制化、所系化相當快速，取代了相當多的既有科系，最近兩三年六、七個相關期刊(另外已經有英文刊物 *Latin America Cultural Studies*、*African Cultural Studies*、*European Cultural Studies* 的出版)<sup>20</sup> 以及無數的書系的陸續出現，同時歐陸為主導的兩份刊物正在推動國際性文化研究學會的成立。我們比較不熟悉的地區像漢城近幾年出現了四、五本文化研究相關的新期刊(如 *Contemporary Criticism*, *Contemporary Thought, Society and Criticism*)，也有成立學會的傳聞；日本許多的學院、系都已加入文化兩個字(如九州大學有社會與文化研究學院)，文化研究成為重要刊物如「思想」、「現代思想」、「IMPACTION」的主要特色，也有聽說有人在推動成立學會；香港科大近期成立了文化研究中心，同時在推動學會的成立，嶺南大學<sup>21</sup> 不只翻譯系與牛津合作出版文化／社會研究譯叢(*Cultural and Social Studies*)期刊，也成立了或許是東亞第一個大學部的文化研究 program<sup>22</sup>，並且規劃在 2000 年成系；除了企圖心旺盛的 *Traces: A Multilingual Journal of Cultural Theory* 規劃將以六種語言同步發行、連結東亞與歐美外<sup>23</sup>，連結東北、東南、南亞及其他各地的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刊物也將在明年四月出刊<sup>24</sup>。這些現象的提出只是在說明，文化研究在台灣出現絕對不是孤立的現象，它必須被擺在更為寬廣的脈絡中來理解。

與其他領域不同，文化研究並不號稱它有普世／普遍主義的性質，因為它的問題意識來自於具體的歷史、社會、文化環境，是在面對特定的問題；但是這並不表示它沒有抽象的理論意涵，好的、令人感動的文化研究往往對身處不同地理環境的研究是有啟發、共振作用的。文化研究不同於傳統社會科學，它沒有固定地書寫格式，它的創造性與書寫形式不可切割。具有開放的在地性，文化研究在世界各地呈現出的風貌都相當的不同；文化研究在英格蘭起自五、六〇年代新左派的風潮，本身就是後來所謂的新社會運動，南非的文化研究在曼德拉上台前，是反種族隔離運動的重要環結，文化研究在澳洲與加拿大也一直密切結合了各種形式社會運動，當代的文化研究在日本承繼了它長遠強大的左翼學術傳統與新興社會運動相接合，文化研究在韓國承繼了八〇年代左翼思想與學運傳統，到目前為止與新興社會運動（特別是工人、婦女與媒體改造運動）密切連結，香港的實踐則聯繫了市民運動及民間抗爭的傳統，文化研究在菲律賓與長期反帝的左翼運動及有相當傳統而又相對新興的 NGO／社會運動（如同運）緊密結合，文化研究在印尼是民間進步反對運動的重要環節，在新加坡是企圖建立市民社會的主力，文化研究在印度更是與女性、社區與環保等運動密切連結，這些實踐讓我們清楚的看到：在過去各地文化研究與進步思想與運動的不可分割性。正是因為如此，透過與運動的接合，文化研究不只聯繫到具體的社會脈動，也傳承了在地的文化論述史；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文化研究其實不是什麼外來的東西，也才能解釋它為什麼在各地能夠快速的崛起。

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是什麼？它的核心關切又是什麼？在一個缺乏泛左翼批判傳統厚度及深度的右翼空間，為了搶奪資源，西瓜靠大

邊是基本邏輯，它是否會被體制快速的稀釋，快速的建制化？成為統治者打擊社會弱勢者的武器？我提出這些問題對於比我年輕一代的朋友來說大概有些 LKK，也可能像是有些不上道地在說教，但是比較歷史的來看，如果說現在台灣文化研究的前身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主要的展現形式是文化評論及文化批判，在那段巨變的時間裡，發揮了相當進步的批判作用，而許多朋友都以書寫的方式參與介入了那個台灣社會巨變最快的過程，那麼我們必須寄望在文化研究的場域中繼續累積批判的傳統，而不是在學院化、體制化的走向中喪失批判及反省的動力。如果把這個論點推到極端，認為我的主要基調是要否定文化研究與學院有任何關係，那就誤解了我的意思；不是的，我的論點只是在拒絕把文化研究鎖在僵硬的學院體制當中(Wallerstein 的新文章中論到未來知識生產的先鋒不在學院中，這是要警惕的)。平心而論，從介入公共領域中的文化批判到學院化的文化研究，我們的論述有更為細緻、更具原創力、更具解釋力？當初所提出諸多迫切的問題有因為向學院的過渡而被深化？如果學院化的走向不意味著能夠深化問題，不能超越前一個世代的限制，那麼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比較正面的來說，文化研究學院化的走向，應該是意味著更為精準的、有批判距離的掌握社會脈動，能夠提出更為深刻的分析，才能逐漸累積、建立起批判思維的進步學術傳統。

## 文化研究在台灣的定位與未來

最後要討論的，是我個人對文化研究這門學問在台灣的看法及定位<sup>25</sup>。在籌辦過程中，文化學會參與計畫的同仁發出了多次問卷及

催繳的訊息，發現大部分的會員並不太理會，所以有很深的挫折感。不論是因為大家都忙，還是其他原因，它所呈現的事實是：文化研究學會與一般學會不同，它不是學術行政體系的延伸下所形成的學術權力機制<sup>26</sup>。因此，這個學會不可能對它的會員有強勢的要求；也正因為如此，它內部權力關係不可能建立在學術行政資源的掌控，不會因為誰佔有行政職位就比較能主導學會的方向。如果用對待其它學會的態度與期盼來同樣的對待這個學會，那可能會相當失望的。与其它學會不同，這個學會應該相信的就是在求變，就是要開拓新的思考空間及領域；它多多少少是因為被打壓而出現的，所以不應該會打壓新的批判方向與動力。在此意義下，學會其實提供了年輕一代學者及評論者放手實踐一些想法的空間，只要動力在，任何的會員都可以用學會來推動他／她想主導的活動方向。我一直認為這個學會的基本性質很可能是一個鬆散、開放、流動性強、沒有也不要太多資源，但是是有活力、多元的慾望流動空間，任何的創造力都可以、也可能在這個場域中發生。縱使有潛在路線上的差異，這是任何組織都要面對的。

文化研究在未來發展上到底可以作些什麼？除了推動在以上討論中提到明顯弱勢的次領域外，文化研究，在這個多變的(套句媚俗的講法)全球化時代裡，或許可以成為具有批判性的多元界面：它可以是建立起台灣文化研究這個知識社群的界面、不同學術領域之間互動的界面、學院與社會之間的界面、與文化圈、運動圈的界面；是在本土化的風潮中，持續作為連結在地與國際的界面。台灣過去十年間舉辦的幾次文化研究相關的跨國會議在被國際上被認為有重要的貢獻，特別重要的是在亞洲的集結，所以在原始預料之外，「文化研究在台灣」不小心就上了國際學術界的版圖成為文化研究在亞洲的重要據

點，以致於在被談及國際性文化研究時重要的象徵符號。更意外的是，我們居然是亞洲第一個成立的文化研究學會。透過這個組織，只要我們不劃地自限，不但有能力來推動台灣學術的國際化，打開人文學界自閉的局面，甚至有義務在亞洲成為國際連結的動力。當然，所謂的國際化絕對不只是口號式地配合國家政策的走向或是回應全球化的壓力，來搞國際性的學術行政，把台灣的符號塞入國際學術的版圖，重要的是，透過如此多元的連結，我們或許可以逐步脫離半世紀來長期作為美國學術的附庸，開始透過與我們結構性位置類似地區的互動來重新自我認識，建立起批判性的主體性。全球化迫使我們將目光作些關鍵性的移轉，把我們從日常生活到學術的主要參考點、參考座標及認同對象變的更為多元，從「西方」、「美國」多元移轉到「第三世界」，到我們所鄰近的「亞洲」，到馬尼拉、漢城而不再只是巴黎、紐約與倫敦，否則我們不只沒有跳出殖民主義以降西瓜靠大邊的殖民認同邏輯，也永遠沒有辦法清楚透過坐標的移轉與比較來辨識「我們」的「自我」，會永遠活在我們的想像認同對象中。特別重要的是，在這個國際化與全球化的過程中保持、深化文化研究所具有批判性國際主義的因子，不是凡事都掉入台灣中心論的自戀／憐，少了國際主義的精神，文化研究很容易成為新保守國族主義回應全球化過程中，國家機器再打造的先鋒隊，與進入國際市場時台灣國族主義的代言人。當然，故事不是那樣悲觀的，它的樂觀性來自文化研究作為多元界面不只是符合所謂不斷越界的觀念，更是多元越界後，具有主體性的雜種性<sup>27</sup>。文化研究的雜種性不只表現在立場、位置，主題、主體，更是在世代、空間與操作方式上；拒絕被任何僵硬的軀域所捕捉，它的混雜、多元、異質性也正文化研究能夠保持不斷變動的活力

之所在。

在論及所謂國際化的問題時，特別要指出的是，國際化並不全等於英文化，台灣作為一個以華文書寫的地理空間，我們因為起步早，至少應該有能力來推動華文地區文化／思想文字的流通與互動。2000年與交通大學語言與文化研究所合辦的年會將擴大參與，公開徵稿，並邀請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北京、上海等地的朋友共同參與，並且透過此次會議開始籌劃能夠在上述各地出版發行的華文文化研究／評論刊物；透過各地及城市間的連結，我們可以打開視野，積極的展開互動。

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它意味著正在起步、有跡可尋、長相不明的一股新興學術動力。我個人雖然主觀的期待文化研究在台灣會是意味著一種進步、開放、有生命力、創造力、批判力、歷史解釋力、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學術場域，但是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其實取決於與這個符號相關連多元主體的慾望與其具體實踐，或許再過十年再來回顧的時候，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可以比較更為清楚的來辨識，更為正面的來對待。

本文為會議開場的組織工作報告

1999.9 初稿；2000.2.24 修訂

1. 國科會人文處曾召開會議、邀集相關學門如中文、外文、社會學等諮詢各方意見、其中確實有與會人士對文化研究存在表示質疑與保留。
2. 在學會正式成立的籌辦期間(1998年5、6月起)，人文處已經主動將文化研究編入次學門，代號HO，與性別研究、宗教研究等一起被視為新興領域。
3. 如所系；當時交大語言文化研究所還沒成立(2000年夏該所正式招生)，清大



亞太／文化研究室不是有資源的教學單位，其他有關文化研究生產的學術機構如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台大城鄉所、東海社會系、輔大比較文學研究所等都不是以文化研究為主要的組織軸線。

4. 除了龔卓軍的文章是投稿外，其他都是邀稿。
5. 大多數參與論壇的學者都在討論中公開發表，他們在自己的學門中相當邊緣，所以不能代表他們自身所屬的學門，這多少反應了文化研究作為一個交叉場域的真實狀態。
6. 在臺灣較具歷史意義的或許是1992年7月清大文學所主辦的 Trajectories: 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ist Cultural Studies 國際學術會議，有先河的指標作用。會前編有《文化展望：邁向新的國際性文化研究讀本》，以英文刊出與會學者的相關論文，由唐山出版社發行；同時部份文章譯成中文，集結在陳光興／楊明敏編的《Cultural Studies: 內爆麥當奴》，島嶼邊緣雜誌社出版。
7. 其實如此的排列可以顯現出臺灣學術思想的殖民性，後殖民論述並沒有帶來相關的反思，其實是相當諷刺的。
8. 學會會員至少包括以下領域：心理學、傳播學、外文、中文、比較文學、建築、地理、語言學、教育、通識、urban studies、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歷史、新聞、族群研究、哲學、醫學、電影、影像、藝術、音樂等等。
9. 目前為止，學會中非學院的成員大多是民間學者及文化圈的朋友，數量上是少數。我們希望學會在未來能夠有更積極的結合。
10. 顧秀賢提及他曾經有幾萬字的口述歷史在某地的文化中心出版。在當時與他的互動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他有意識的企圖開啟文化研究的空間，如對 Raymond Williams 的介紹等。
11. 相較於今天的副刊，當時充斥著批判性分析的龐大能量確實不能相比。
12. 隨著電子報的出現，以及網站的可能性，這種書寫或許會再開始出現。
13. 許多人大概都有被民意論壇版退稿的經驗，而原因不明。
14. 以她／他們謀生的職業來區分包括了專業社會運動人士、另類藝術工作者、劇場工作者、文字工作者、學運份子、記者、編輯、美編、編譯、醫生、大

學生、研究生、待業青年、電腦工程師等。

15. 這一夥跟學院有關的人最為人討厭的就是：對當時很多反對派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的「不正」，「歪」與「亂」破壞了正派知識份子／學者的形象。比較後設的來看，這或許是另類份子的出現。
16. 根據我的理解，大概只有何春蕤在九〇年代中起的研究計畫裡，一直有系統的在收集這些資料。而顧秀賢也在某文化中心做過數萬字的口述歷史。
17. 這其實是一個不能迴避的事實。只要從當初發起義工的名單上大概就可以看到中間有一定比例的人是被封殺的對象。到底有多少於「文化研究」的符號有關其實不得而知，在那樣的時空中，總體上確實造成某種非關個人「結構性」力量運作的感受，在各個場域中運作。
18. 我個人是 *Cultural Studies* 期刊的編輯委員，當時前兩年刊物開始策劃去年出版的 *Institutions of Cultural Studies* 專號時，很清楚它的問題只是內在於美國學院，目的在正當化文化研究的建制化，才怪異的推出這種其他學門不可能也不必要的專號，所以編委會內部也有相當的雜音。
19. 舉些例子，在美國文化研究相關的刊物如 *Public Culture* 大概不到一千本，*Cultural Studies* 不到一千五百本，*Boundary 2* 兩千多本，英國著名的 *New Left Review* 最多不過四千本，新興的刊物 *Postcolonial Studies* 不過 150-200 本，而在日本像「思想」與「現代思想」這樣的刊物大概有九千到一萬的發行量。我記得 1994 年 *Public Culture* 及 *Positions* 的編委來台灣開會，聽說像《台灣社會研究》這樣的刊物能有二千本左右、《島嶼邊緣》有二千五百至三千的發行量、都難以想像。
20. 例如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UTS) Review: Cultural Studies and New Writin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Feminist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 Emergences, Soundings, Topia: Canadian Cultural Studies*.
21. 已於 1999 年由學院改為大學。
22. 據我了解、這個 program 已有六位專任師資、Meaghan Morris 也將在明年加入。
23. 在臺灣的合作對象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由編委于治中負責，預定明年

底前出版。

24. 這個刊物將由 Routledge 出版發行、目前編輯部設在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Editorial Collective 成員遍及富岡、大阪、東京、漢城、北京、新竹、香港、馬尼拉、曼谷、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Banglore(印度)、雪梨、夏威夷等地。網址：<http://www.inter-asia.org>
25. 我特別要說清楚的是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與學會其他理監事無關。
26. 舉例來說，如果外文學門跟外文系的老師要相關教學研究資料作為學術評定的根據，那麼很可能外文系的同仁必須提出相關資料。
27. 在其他地方，我稱之為批判性的混合(critical syncretism)與 hybridity 之間的差異。